

马涛 著

走出中世纪的曙光

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走出中世纪的曙光

——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

马涛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中世纪的曙光——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马涛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8

ISBN 7-81049-981-5/F · 850

I. 走… II. 马… III. 社会思潮-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D09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564 号

☐ 责任编辑 王永长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Zhouchu Zhongshiji De Shuguang

走出中世纪的曙光

——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

马涛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装订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8.625 印张 216 千字

印数: 0 001—1 500 定价: 19.00 元



马 涛 男，汉族，1957年8月出生于陕西三原。1996年初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在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常委、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哲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有关经济学和经济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多部，主持过多项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多次获国家和教育部科研奖励。代表性论著有：《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理性的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传统的创新——东方管理学引论》、《经济思想史教程》等。

内 容 提 要

本著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一部专门研究、论述晚明清初思潮的论著,该著的特点是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囊括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潮、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科学思潮,论述广泛又重点突出,自成体系。其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以“救世启蒙”来概括这一时代思潮的特点,认为这一思潮含有救世和启蒙两大方面。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是救世启蒙思潮在经济领域的表现。这一思潮的历史地位是,一方面它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总结,另一方面又孕育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某些因子,是中国传统思想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该著还借鉴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这一思潮为什么没有能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分析,并与西方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某些结论。

目 录

第一章 救世与启蒙：晚明清初思潮的新阐释/1

思潮的命名/1

救世与启蒙思潮的异同/3

理论渊源/10

历史地位/12

第二章 “以理抗势”的救世思潮/20

吕坤“以理抗势”的救世精神/20

东林学派“以理抗势”的斗争实践/26

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34

理论救世的一次尝试/45

第三章 科学救世的成就/53

强调会通中西之学/55

重实地考察和实验的科学新风/64

推崇数理逻辑的研究方法/88

第四章 启蒙思潮的叛逆精神/98

启蒙思潮与市民阶层/99

王阳明与启蒙思潮/102

心学的分化与启蒙思潮的意义/112

第五章 文艺启蒙中的情痴/138

启蒙思潮对文艺思潮的影响/139

“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启蒙思潮/144

第六章 救世与启蒙思潮的交汇/170

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171

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190

“工商皆本”的社会阶层新论/206

第七章 内卷与发展：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反思/222

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对商业资本的压制/224

产权安排与商业资本的离析/235

意识形态对商业资本的侵蚀/240

中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现代的科学体系/247

现代启示/252

参考文献/265

后记/267

第一章

救世与启蒙：晚明清初思潮的新阐释

晚明清初(指 16 世纪至 17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年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更新,人文精神在觉醒,禁欲主义受到了批判,专制主义受到了鞭挞,怀疑原则,主张学问贵在自得、会通中西等孕育有近代思想因素的提倡,强调实践、实验的科学精神,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和学以致用功利旗帜的高扬,市民审美情感对传统审美趣味的冲击,个性解放的倡导,等等,构成了这一思潮的方方面面。

思潮的命名

如何概括和评价这一时代思潮,一直是学术界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不同时代与学术背景的学者都可以提出一套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建立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如有的学者主张叫做“资产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潮”,有的主张叫做“地主阶级的批判总结思潮”,有的主张叫做“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还有的主张叫做“实学思潮”,等等。这些提法和概括都很有意义,但又存在问题。例如,“资产阶级早期启蒙说”有拔高之嫌。因为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启蒙”的确切含义,是指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的思想革命。而在中国的 16 世纪和 17 世纪,还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晚明和清初的许多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主义有所

批判,但着眼点仅是批判明代统治的流弊,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封建。尽管他们批判的言辞相当激烈,理论上却没有摆脱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框架,批判的目的只是在救弊,走出一条振兴改革之路。他们的理想社会仍是“圣人治天下”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理想社会。因此,在这一思潮中所经常使用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虽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说明,赋予了某些新的含义,但它与理学仍有相通之处,仍然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哲学意识形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才能出现。而“地主阶级的自我批判总结”说的概括,则又忽略了这一思潮中有王学左派及市民文艺理论所提出的一些新概念、范畴和命题,以及经济思想上的重商意识和有利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些内容已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理论先驱,因而又具有某些早期启蒙的意义。因此,“启蒙说”和“批判总结说”都仅仅概括出了这一思潮中的某一方面,而不能兼顾全体。其他几类说法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晚明清初的思潮包含有两个性质不同的方面:一个是救世思潮,一个是启蒙思潮。救世思潮是由一批尊信程朱理学的地主阶级进步的思想家所开启的批判改革思潮,思潮的主旨是批判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弊端,积极倡导改革。晚明的科学思潮是受理学格物穷理说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而兴起的,也可以视作是救世思潮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延续。启蒙思潮则是指王学左派及受其影响的文艺理论思潮。启蒙思想家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在中国封建社会尚未崩溃而各种矛盾已充分显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占据社会统治思想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倡一种适应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念。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构成了救世与启蒙思潮兴起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救世与启蒙思潮中的许多思想家如东林党人中的李三才、顾宪成,泰州学派中的王艮、

何心隐、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等，都与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的崛起有着这样或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将这一思潮用“救世与启蒙思潮说”加以概括和论述是较为妥当的。

救世与启蒙思潮的异同

救世与启蒙两股思潮在内容与特征上有同有异，异大于同。两者在思想上也有批评和论争。

救世与启蒙思潮相同的方面表现在面临政治弊端日渐凸显和经济凋敝衰败的情况时，都提出了一些改革时弊的主张，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救世意识。不论是救世派还是启蒙派，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有某种理论上的差别甚至矛盾，但在针砭时弊上是相同的，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其僵死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领域，他们全面地对理学或心学末流的流弊进行了批判，其内容遍及哲学、经学、史学、伦理、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冲击着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闪耀着新的思想光辉；二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他们针对社会政治的各种积弊，多方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不论是启蒙派还是救世派，都提倡自由讲学和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如泰州学派十分重视开展讲学活动，他们利用农闲时间聚徒讲学，所讲的都是百姓当下日用之学，即使讲“经书”，也“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以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为主，因而受到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何心隐对张居正毁天下书院、禁止自由讲学的文化专制政策极为不满，写有《原学原讲》一文，强调“必学必讲”。为争取自由讲学，他还准备“诣阙上书”，辩于朝廷，鸣于天下。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者，面对“天崩地陷”的时代，愤起指斥朝政腐败，要求改革，在遭到迫害和贬斥后，仍“志在世道”，

以国家危亡为重,修复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强调把读书和关心国事相联系。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享年62岁。万历八年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万历二十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后因他在立皇太子和会推阁臣问题上与神宗及权臣抵触,于万历二十二年被革职回家。回故乡无锡后遂修复东林书院,创建东林学派,从事著述与讲学活动,直至逝世。

东林学派针对万历初年以来朝廷下令禁毁天下书院、禁止聚徒讲学的文化专制政策,提出了自由讲学和自由结社的要求。东林学派还把“士”之讲学,看成是“农之于耕”一样具有同等的合法权利。对于科举制度,泰州学派和东林学派都表示不满。王艮指责“以文艺取士”的科举制度会使人“营心于富贵之末”,因而要求恢复汉代的选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并行,认为这能克服科举之弊,得“天下之贤”。东林学派人士对科场腐败深为愤怒,钱一本就曾上书揭露内阁隐瞒科场舞弊事件,要求革除因舞弊而得中的官宦勋贵子弟。顾宪成更明确表示,取士应打破等级贵贱的标准,“海内共以为贤者,不惜破格用之”。在经济上不论是救世派还是启蒙派,都提出有一些相近的改革主张。如泰州学派的王艮提出了“务本而节用”说。他所说的“务本”就是要“众皆归农”,发展生产,安定生活。他所说的“节用”,就是“去天下虚糜无益之费”。王艮晚年时,还在家乡安丰盐场试图从土地所有制入手,提出了“均分草荡”的改革方案,即在灶户不均、贫者多失业的情况下,按“摊平”均分的办法,缓和社会矛盾。李贽也看重经济改革,甚至提出了“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的论点。

两者的不同是主要的,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基础、思想渊源和学说宗旨等方面。就社会基础而言,救世思潮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而启蒙思潮的社会基础则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就

思想渊源来说,救世思潮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是尊信程朱的学者,如罗钦顺、丘濬、吕坤和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等人,他们的救世思想是由程朱理学中的批判改革意识发展而来;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属王学左派,如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和李贽等人。

就学说宗旨而言,救世思潮主要表现为一种锐意于社会改革的救世主义,他们革新朝政的最终目的,只是希望建设一个能行“仁政”、能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商人、市民利益的政府。他们可谓地主阶级的“补天派”。为了挽救晚明的社会危机,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如罗钦顺、王廷相、丘濬、吕坤和顾宪成等人,不仅在田制、水利、漕运、荒政、赋税、兵制、边务、吏治、科举诸方面揭露了当时的各种弊端,而且还提出了各种改革的方案,有的甚至还亲自发动和参加了社会政治的改革活动。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面对“天崩地陷”的严峻现实,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谈,提倡士大夫“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办学宗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更是东林党人救世济民理想的生动写照。针对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肆意搜刮压榨,致使“万民失业,朝野嚣然”的严重情况,东林学者一方面上疏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则提出相应的制止矿监税使的具体办法,即把开采催税之权从宦官手中转交给地方官,把无止境的税银定额定下来,以减轻各地商人和百姓的沉重负担。显然,这在不能完全制止矿监税使害民的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此外,东林学者还提出了减免商税,以“惠商”和发展商业;严惩肆虐乡里的税棍,维护商人利益;要求改革苛税、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经济;兴屯田、改土耕种,以强兵足民等主张。如果这些改革主张能够得到实施,不仅对工商业者和农民百姓有利,而且也适应了江南地区以至全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君子,

编印《明经世文编》，其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种理论的借鉴。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更是一代“救世”的杰作。在晚明科学思潮的促动下，中国古典科学技术进入了总结阶段，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划时代的科学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都是这一科学思潮的产物。这批科学救世的思想家，不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思想，也开创了强调会通中西之学，重实地考察和实验、推崇数理逻辑的科学新风。

启蒙思潮则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有多方面的表现。在哲学上表现为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个体解放和人文主义，倡导理欲统一说，从而使“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变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然人性论。如王艮把人性的本体作为生理自然的要求来考察，以“安身”为“天下之大本”。他所谓的“安身”，首先是要让人们吃饱穿暖，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力。他肯定人的欲望、饮食男女都是“天体之性”，故不容统治者人为干涉。他的人性自然就是“良知”的观点，不但改变了王学“良知”的内容，还摒除了阳明良知说中的神秘气氛，反映了人民大众捍卫自己生活权力的强烈意愿。李贽又进一步提出了“人必有私”的观点，认为物质享受是每个人之所欲，圣人也不能例外。他的“私者人之心”的论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显示出了强烈的市民意识和反叛精神。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还蔑视封建偶像崇拜，公开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伦理道德上表现为公开抨击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君为臣纲。泰州学派虽没有否定君权，但却有一个“人人君子，刑措不用，道不拾遗”的社会理想。王艮依据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设计了一幅改造现实社会的蓝图——使人人各得

其所,“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大家过着富足康乐的太平生活。其后学何心隐则更进一步试图突破封建伦常关系,建立一种纯属师友关系的“老安少怀”的理想平等社会。黄宗羲则强调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唐甄更自标五伦中“我独阙其一(君臣)也”。在政治上,他们以民本主义为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多方地限制封建君权,甚至提出了君臣共同治理天下的主张。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还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唐甄继黄宗羲之后,指出“自秦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还企图通过“置相”(接近于近代责任内阁总理)来实现他的“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政治理想。这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空想,但却表达了平民大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理想社会的无限憧憬。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崇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黄宗羲语),有的还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地位的提高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表现为反传统的浪漫主义和对封建正统文艺的鄙弃,以及对人情欲的重视和歌颂。徐谓的“本色论”、李贽的“童心论”、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以及小说“三言二拍”和《金瓶梅》的出现,都是其表现。总之,这些启蒙意识,在原则上已不同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救世思想,它是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他们可以说是封建主义社会内部的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革天派”。相比之下,救世思想家则囿于理学框架,继承程朱理学的观点,恪守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如顾炎武撰写《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他一生所从事的学术活动都在于总结明亡教训,提出救世药方。尽管他至死都没有出仕清朝,直接参与政事,但他的一套“救世”理论,仍通过其学生徐乾学等对当时的政治实践起了一定的现实作用。顾炎武梦寐以求的,不外乎是“有王者

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重现一个堪与汉唐“贞观之治”比美的强盛的汉族地主政权,而不是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

两个思潮的不同还表现在启蒙思潮中的许多人物由于强调“本心”个性的解放,有着一种流于“禅”的倾向。如王阳明、李贽、焦竑、徐文长、公安三袁、汤显祖等都对佛教有相当的研究和认同。王阳明虽然也有辟佛之论,但并不能掩饰其“阴取”佛学的事实,他所说的“心即理”实是由唐宋时期的僧人们首先开其先河的。阳明自己也有融会儒释的论点^①。诚如陈建所言:“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三教为一,无他伎俩。”^②王门后学及其泰州学派更是公开谈佛说禅。流风所及,致使形成了“万历以后,禅风日盛,士大夫无不谈禅”的气象^③。文艺启蒙思想家袁中道在《传心篇序》中论“心”时,讲述了这其中的原因。他说:“世间高明之士,所以轻宋儒者有故,心体本自灵通,不借外之见闻。而儒者为格物支离之学,其沉昏阴浊莫甚焉。心体本自潇洒,不必过为把持,而儒者又为庄敬持守之学,其桎梏拘挛莫甚焉。世间之大智慧者,岂肯米盐琐碎,而自同木偶人哉?宜其厌之而趋禅也。”^④袁中道对禅学流行的原因讲得更清楚:禅学的自然悟道不受羁绊的学说特色有利于反对程朱理学的束缚。救世思想家则批判王学这一禅学化的空无理论倾向,认为它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置国艰、民危于不顾,有背于儒学经世的宗旨,是“以学术杀天下”。在对王学批判的同时,主张“学宗程朱”,立足于发展理学。他们从总结理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途径,肯定了理学各派不同观点的短长和它们

① 如王阳明说:“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王文成公全书》卷21《答徐成之》2。

② 《学部薪辨》卷之九《续编》下。

③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10。

④ 《珂雪斋集》卷10。

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反对“空言性理”，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把朱熹偏重于道德伦理的“即物穷理”发展成为“即事为学”的实学概念。如吕坤有言：“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①“世之病讲学家者，其说有二：曰伪；曰腐。伪者，行不顾言；腐者，学不适用。”^②他们还把理学家最常用的“天理”改造成为“天然自成之条理”，赋予了客观事物规律的新含义。救世思想家在学术上提倡求实致用的新学风，对于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起着积极的影响，与明清之际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和众多杰出学者的出现，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两个思潮之间有着上述的区别和不同，两派学者之间也就经常相互批评。如东林学派的顾宪成批评启蒙思想家何心隐，说他：“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人。”^③对李贽否定一切道德规范和全面肯定利己主义的“私”，从而否定了作为社会的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顾宪成加以指责说：“学术到此真成涂炭！”^④王夫之也曾抨击“李贽以佞舌惑天下”^⑤，痛斥李贽之流“导天下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列于猛兽乎？”^⑥直斥李贽为“洪水猛兽”，视为异端之尤。于《藏书》更是深恶痛绝：“李贽《藏书》，为害尤烈，有志者勿惑，斯可与博文之学。”^⑦顾炎武对李贽也十分尖刻：“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⑧骂李贽为有史以来“无忌惮”之“小人”。

① 《呻吟语》卷5《治道》。

② 《去伪斋文集》卷5《杨晋庵文集序》。

③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④ 《泾皋藏稿》卷5《东高景逸大行人》。

⑤ 《名堂祖绪论·外篇》。

⑥ 《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

⑦ 《俟解》。

⑧ 《日知录》卷18《李贽》。

理论渊源

救世与启蒙两股思潮分别渊源于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朱、陆的歧异,是造成两股思潮各自发展的内在逻辑渊源。

朱熹主张宇宙的本体是“理”,认为“理”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超越而普遍的存在。陆九渊则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均在我心中。在他的哲学中,心即是理,心与理完全合一,没有分别。他的心与理“实不容有二”的话就是针对朱熹的“理在心外”而言的。朱熹的“理”含义有多种,它首先是指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这种形而上的本体,在朱熹看来是一种超时间、超空间的理性本体。此“理”至高无上,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上。这个“理”,具体到万事万物来说,就是万物之“道理”、“规律”。“理”还是道德的原则。总之,朱熹的“理”有本体、理性、规律、法则等多种含义。但总的说来,它是自然规律,又是伦理法则。在他看来,伦理法则来源于自然规律,其本质则是宇宙的理性。朱熹的这一“理本论”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晚明的救世思想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天下惟理为最尊”的命题,认为即使天子的权势,也应服从天理。这是在明确主张“理”高于“势”。这里的“理”,既是宇宙的理性,结合社会政治而言,又是政治理性的原则,天下人心的公意。这里的“势”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权势。救世思想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理”与“势”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但作为一位儒者,在这一“理”与“势”的矛盾冲突中,只能选择“以理抗势”,用“理”来限制皇权君势,坚持原则,甚至在“以理抗势”中不惜一死,决不苟且偷生。因为在他们看来,“理”尊于“君”、尊于“势”,天子之势也须屈从于“理”,故儒者只可以从“理”而不从“君”,从“理”而不从“势”。这种“以理抗势”的学说,成了救世思想家批判现实政治黑暗,力图救世解弊、改革社会实践的内在精神动力。